

贺龙入党寻找新的革命之路

□ 卫惠贤



1921年，贺龙率部驻防桃源，常和桃源县的一些知识界人士接触。当时的桃源，受五四运动影响，新文化运动颇为活跃。桃源有两所著名的学校：桃源女子师范和省立第二师范。这两所学校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影响下，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两所学校的校长彭施涑、田佐汉、陈伯陶都是贺龙的座上客。贺龙对彭施涑的革新精神和女师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不仅经常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向元姑、女儿贺金莲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9月，贺龙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师陈图南，另一位是陈图南在日本的同学花汉儒。好客的贺龙留他们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白天陪他们同游桃源，指点江山；晚上，与他们灯下同坐，纵论天下大事。这两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政治主张。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虽然不错，但权力、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将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花汉儒则向贺龙宣传苏俄的社会主义。他告诉贺龙，苏俄在列宁领导下已经打倒了沙皇，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五四运动说到底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苏俄的路是工农当家作主的路，也是中国要走的路。这两个人观点截然不同，他们时常争论不休，甚至弄得面红耳赤。

这两个人宣传的东西，都是贺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听得格外仔细，还不时插嘴问些弄不清的问题、名词术语什么的。他觉得，陈图南讲的，仅是一种想法，似乎根据不足，颇似空想。理

论上说得好看，事实上很难做到。花汉儒说的，却是一个国家已经做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尽管这个国家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他不清楚。他多次请花汉儒具体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花汉儒告诉他，俄国革命是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领导的。

贺龙问花汉儒：“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政党？”

花汉儒说：“有，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即共产国际——笔者注）。”

“中国有没有？”
“中国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并对贺龙说，“云卿兄，带队伍光有人 and 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来作靠山，那才稳当，有方向，有力量。”

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听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条有道理。我就问花汉儒，有没有谈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一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个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1926年8月下旬，贺龙率师攻克慈利，月末进入津市、澧州。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

两人一见如故。贺龙笑着说：“很对不起你哟，在铜仁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吃了你家谷仓里好多谷子呀！”

“不要紧嘛。”周逸群大笑，“我家的谷子，只怕革命军吃得少了。越吃得多，越好打仗啊！”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30多大担啊！我们刚到铜仁，正碰上缺粮，幸好你丈人老子大方，听说我贺龙缺粮，要多少挑多少，还不要秤秤。”

“这完全应该嘛！”周逸群说，“我家的谷子都是农民种的。看来铜仁的农民运动不兴旺，否则，这些谷子应该没收，全部交给你们吃。”

听周逸群这么说，贺龙心想，听说黄埔军校，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里有不少共产党，周逸群可能就是共产党。但他不便直接问人

家，那样太不礼貌了。他眨眨眼，问道：“逸群先生，我在铜仁看见过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黄埔有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不知这个组织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周逸群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学会，反对军阀，反对独裁呀！”

“他肯定是个共产党。”贺龙这样想，于是，坦诚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诸如，革命政府怎样领导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宣传队的宗旨是什么？周逸群十分认真地作了详细回答。从他的回答中，贺龙听到了许多带兵以来从未听过的新鲜事，感到十分兴奋。

第二天，贺龙召开欢迎大会，把周逸群和宣传队介绍给全体官兵。周逸群在一师同贺龙朝夕相处，对贺龙思想影响很大。贺龙感到，周逸群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按照他讲的一套来治军，不仅部队能改造好，而且革命也有了办法。他觉得一条新路就在脚下了。

贺龙想写一段新的历史。1914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没有参加，而是想参加已经找到的共产党。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当时，中共中央有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当然不敢贸然表态。他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来找你的。”但是，贺龙这个人，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东西，是必须追求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求加入共产党也一样。他并不因为周逸群的婉言而停止、等待，而是不断地要求。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拜会了贺龙。贺龙、周逸群热情地把他迎进屋里。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请周恩来就座。他让送茶的副官离去，自己接过一杯茶，恭敬地送到周恩来面前，说：“好极了。周先生，请坐谈，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起来，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开枪动炮呢！”

贺龙听到了大笑起来。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

会，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及有关问题。最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惊。什么？起义军总指挥？他知道到南昌来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了二十军以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担得起这个总指挥呢？他坐不住了，站起来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打断了他的话，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头了。”周恩来高兴地说：“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定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们二十军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了推迟到8月1日凌晨举行的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考验进一步证明了贺龙对党的忠诚。不久，贺龙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心的坚定性，看到了他那颗火热的革命心。

（摘自1999年第8期《支部建设》，原标题为《十年征战 十年探索——贺龙要寻找新的革命之路》）

均水深为1到3米。所以，红军从于都的8个渡口出发时，有5个渡口是搭设浮桥。根据最新的研究，红军渡河的意图，其实也为敌人所知晓。他们料定红军会从西南方向突围，于是在沿途布下了重重封锁线。为了监控红军的动向，敌人的飞机也时常在于都上空盘旋。为使渡河行动不被敌军发现，所有行动只能在夜间秘密进行。从1934年10月17日夜间至20日，在4天的时间里，红军每天下午5点开始架设临时浮桥，通宵渡河后，第二天早上6点半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反复拆搭有15次之多。为了不留痕迹，红军夜间渡河时，每个连队只配发4个火把，早上还要把河滩上的脚印清除掉。

在34万于都人民的紧密配合下，86万人的中央红军渡河时敌人竟毫无察觉。直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敌人才知道红军已经向西南突围。这段历史被后世誉为“30万人共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一双黄麻鞋：承载红军的牺牲精神。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的藏品中，有一双绑着毛线球的草鞋。这双鞋是一位老红军的未婚妻为其编织的。这位于都老红军叫作谢志坚，在他跟随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前夕，他的未婚妻春秀送给了他一双鞋。鞋是由黄麻编织而成的，质地柔软，非常经久耐穿。

对他而言，这双鞋异常珍贵，所以在长征途中他不舍得穿。总共才穿过两次，但这两次意义非凡。第一次是在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时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这是毛泽东《西江月·秋收起义》的诗句，它描述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情景。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师长。为了亮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鲜明立场，毛泽东提出起义应该打出一面自己的旗帜，并责成工农革命军参谋何长工具体负责。

这面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成，旗面中央是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则是镰刀和斧头，在紧靠旗杆一条10厘米宽白色旗裤上，赫然写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这面旗子，既可以理解为党旗，也可以理解为军旗。从此，我们的党有了自己的旗帜，表明了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标志着中国革命必将走向胜利。

（摘自2013年第7期《中国档案》，原标题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旗式样》）

党内第一个使用“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

□ 何立波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论述“纸老虎”问题最深刻、最全面的领导人，但毛泽东并不是党内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党内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是蔡和森。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第2期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批评一些只知空发议论貌似强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时，第一次使用了“纸老虎”的概念。

他说：“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
（摘自2011年第7期《党报博览》，原标题为《最早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

20世纪80年代，在他把鞋捐给纪念馆的前夕，他亲手把毛线球绑在鞋上，以缅怀自己的未婚妻。最令人动容的不是他们的爱情，而是他们为了国家、为了红军舍去相聚团圆，投身于革命中去。这种成全大我牺牲小我的精神，存在于每个红军战士的生命里。

一艘渔船：承载于都人民的红土情怀。“曾大爷捐寿材搭浮桥”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长征出发搭设浮桥时，能用的木材都用尽了，这时一位姓曾的老大爷将自己百年后用的棺材板也拿了出来……如今，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还陈列着搭浮桥用的木板、渔船，还有船篙。而其中的渔船和船篙，一样有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1934年10月16日，正在于都县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的李声仁几人被红军招呼到岸边，并被告知说：“我们有一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过河去打国民党反动派，想请你们帮忙渡河。”当听说

是自己的队伍要渡过河去打“白狗子”，李声仁心里高兴极了，二话没说，当即答应下来。下午5时，李声仁和父兄等人就把十几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的北岸（也就是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渡河出发的8个渡口之一，位于于都县罗坳镇的石尾渡口）。6时左右，红军分批依次登上了他们的渔船。李声仁和妻子同撑一条大渔船。他在船头撑，妻子在船尾撑。当时的于都河有600余米宽，且河水湍急，波涛汹涌，最深处有20多米。同时又在晚上，必须全神贯注，奋力撑船，稍不注意就会翻船。当他们把这支红军队伍全部送过河时，已是凌晨4时了。

第3天，又有一批红军队伍要渡河，李声仁和父兄等人从晚上7时开始，将一船又一船的红军官兵送过河去。当时，由于情况十分紧急，他们一直没有休息，直到早晨5时才把红军全部送完。虽然这时他们个个累得骨头像散了架似的，但他们心里却充满了自豪与喜悦。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渡送的是哪支红军队伍，后来才知道是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左翼后卫红5军团第13师。红军渡河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占领了于都，并开始疯狂地搜捕李声仁等送红军过河的船工。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们只好远走他乡，常年隐姓埋名漂泊在江西泰和县、万安县、赣江十八滩一带。

（摘自2016年第10期《时代主人》）

伟大长征出发地

于都

忆往事

□ 詹承东 严金平